



红安

两百将领传

第二卷

《红安两百将领传》编委会 编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红安两百将领传

(第二卷)

《红安两百将领传》编委会 编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安两百将领传/《红安两百将领传》编委会编著.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6
ISBN 7-5073-0997-5

I.红… II.中… III.①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
生平事迹—红安县 ②革命烈士—生平事迹—红安县
IV.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1235 号

红安两百将领传(第二卷)

《红安两百将领传》编委会编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编 100017)

北京华正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625 字数 250 千字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4000—6000 册

ISBN 7-5073-0997-5/K·464

两卷 定价 59.00 元

前 言

红安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和将军第一县。革命战争年代，红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献出了14万英雄儿女的宝贵生命，走出了董必武、李先念等几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陈锡联、秦基伟、韩先楚、王建安、周纯全、郭天民、王诚汉、王近山、刘飞、刘昌毅、李天焕、张天云、张仁初、胡奇才、徐深吉、徐斌洲、詹才芳等一大批功勋卓著的开国将领。新中国成立后，又有数万红安籍青年响应党的号召，先后应征入伍，戍边卫国，其中吴晓恒（女）、黄俊峰、胡先贵、江建曾、罗毅、秦卫江、李平、刘晓琨等同志脱颖而出，成为共和国新一代将军。

为了让当代青年更好地了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开国将领们的光辉业绩，学习革命前辈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顽强的战斗作风、高尚的思想品质、无私的奉献精神，并从新一代将军的成长经历中受到教育和鼓舞，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根据中央、省、市党史部门的有关文件精神 and 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中共红安县委、红安县人民政府决定成立以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为主任的《红安两百将领传》编委会，下设办公室（由县委党史办公室兼），在广泛征集资料的基础上，编纂一部多卷本的《红安两百将领传》，奉献给广大读者。

衷心感谢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刘华清上将为《红安两百将领传》题词。

《红安两百将领传》立传对象为：红安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红安籍军官；战争年代曾在人民军队中从事军政领导工作，建国后担任副军（副省、副部）级以上职务，或享受副军（副省、副部）级以上待遇的红安籍高级干

部;战争年代牺牲的副师(副地)级以上红安籍革命烈士。全书拟分五卷六册和若干本专辑,陆续编辑出版。第一卷由“特别篇”和“上将篇”组成,出一册;第二卷为“中将篇”,出一册;第三卷为“少将篇”,出上、下两册;第四卷为“高级干部篇”,出一册;第五卷为“英烈篇”,出一册;专辑为“新一代红安籍将军”,暂不定册数。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一、红安,原名黄安,1931年12月第一次改名为红安。一年后,其西部二程区、西北部仙居区各一部分划归新设置的湖北省礼山(今大悟)县,北部紫云区一部分划入新建的河南省经扶县(今新县)。所划出的地方均是当时红安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地带,刘华清、吴先恩、高厚良、吴世安、吴林焕等数十名开国将领和著名军事家、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烈士等,就是从这些地方走出来的。他们本是红安人,红安人民将永远为他们感到骄傲和自豪。但鉴于大悟、新县也在为他们立传,也在编撰类似书稿,为了尊重邻县人民对老将军的感情,根据行政区划的现状,这些将军及相关人物的传记,暂不编入本书。

二、尊重历史,实事求是,这是编撰人物传记尤其是中共党史、军史人物传记必须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我们在编纂本书的过程中,始终遵循这条原则,力求所有传记资料准确可靠。但由于年代久远,有些人物资料来源单一,加之编者水平所限,书中可能存在某些不足甚至错误之处。我们热忱欢迎知情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并提供有关资料,以便今后再版时补充、订正。

三、受资料限制,本书传稿篇幅(字数)以编者所掌握资料的多寡而定,并非其它。

四、除第一卷“特别篇”外,各卷(册)传记的编排均以传主姓氏笔划为序。

编 者

2001年3月19日

目 录

中将篇

前言	1
王近山	1
刘 飞	51
刘昌毅	87
李天焕	137
张天云	167
张仁初	189
胡奇才	211
徐深吉	241
徐斌洲	265
詹才芳	289
后记	332



王近山

王 近 山

王近山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军首任军长兼政治委员,一代战将。他原名王文善,参加革命后因作战勇敢过人,犹如猛虎,大家敬佩他,给他取了个绰号——“王疯子”。

革命战争年代,王近山是徐向前总指挥和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倚重的一员杰出战将。他戎马一生,先后7次负伤,率领部队打了许多大仗、硬仗、恶仗、苦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赫赫战功,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陈赓、陈锡联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称赞。

新中国成立后,他率部参加抗美援朝,指挥志愿军第十五军和十二军,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两次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自由独立勋章。1950年2月起,历任川东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山东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副部长,南京军区副参谋长、顾问等职。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

1915年10月11日(农历九月初三),王近山出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桃花区许家田(现属高桥镇程河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王佑成原本是“书香门弟”之后,琴棋书画,虽不娴熟,但

无一不通。不料,在王佑成尚未成年之时,王家遭奸人陷害,又得罪了县衙,弄得家破人亡,仅留下几间陈旧的青砖瓦屋和一大堆残缺不全的书籍。后来,死里逃生的王佑成继承了这份家业,娶后头湾吴氏为妻,靠种佃田和打短工为生。王近山上有姐姐冬英,下有大弟连山、小弟太山和妹妹莲英,全家大小7口,相依为命,艰难渡日。

小时的王近山,白皙的肌肤,端正的五官,匀称的身材,活泼的性格,村里无人不夸。父母见他格外聪明,又是长子,为了重振家业,使“书香门弟”的荣耀得以延续,于是咬紧牙关,借钱将年满8岁的他送到离许家田约二里地的冯家田念私塾。小近山似乎明白父母的心事,学习十分用功,从不贪玩,私塾先生对他多有赞许。然而,就在王近山进私塾后不久,父亲却患了一场重病,每隔几天就要花钱买几付中药服用。沉重的债务压得王家老小喘不过气来。一年后,小近山被迫辍学回家。在家里,他放牛、砍柴、种田,样样都干,姐姐冬英则纺线织布。姐弟俩同心协力,帮助母亲操持家务,照顾父亲和弟妹。

放牛时,王近山当起了“娃娃头”。他把小伙伴们组织起来,分工把人照看牛,把人捉鱼,把人打鸟,把人采野果和扯胖草根(味甜,可食),所有收获由大家共享。王近山最拿手的本领是用弹弓打鸟,落鸟十弹九中,飞鸟十发也能打下二三只来。尽管他贡献最大,但分到的东西却与别人一样多,从不主动多要一点。他明事理,好打抱不平,小伙伴们有什么为难的事总爱找他出主意,帮助解决。有一天,邻村有个十四五岁的少年无故欺负许家田年仅9岁的敬伢,强迫敬伢把自己砍的柴禾分一半给他,敬伢不依,两人争吵起来。敬伢挨了打,柴禾又被对方捆走,心里不服气,于是就找王近山,要他帮忙出口气。第二天,王近山带着敬伢在山上找到了那个少年,先是好言相劝,要他向敬伢赔理,并退还柴禾。谁知那少年不肯当面认错,提出要王近山摔跤比输赢,输了就按王近

山说的办,赢了则不许追究。论个头和力气,王近山很难胜过对方,但他有的是窍门。他朝地上瞥了一眼,计上心来。两人合抱后,王近山借助跟前一棵大树莛的撑力作用,用左脚将其顶住,右脚使劲一扫,眨眼之功,便把对手摔倒在地。这时,站在一旁观战的敬伢高兴地跳起来,随手拣起一根竹条,准备狠狠地揍那少年一顿,以解心头之恨。王近山立即制止说:“不能打人家!他和我们一样,也是穷人,穷人不能打穷人!”那少年听了这话,既羞愧又感动,当即兑现诺言,还与王近山、敬伢交上了朋友。

少儿种田,在红安籍众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个人经历中,王近山不是最早的一个,但扶犁耕田恐怕要数他为第一。犁田是种田这个行当中最难学的一项农活。十一二岁的王近山,在父亲的指导下,花了半天的时间,就基本掌握了犁田的要领。但他毕竟年小,个头又不高,不可能像大人那样居高临下,用一只手握住犁把,扬鞭吆喝,稳步前进,而只能肩扛犁把,使劲把握平衡,缓慢跟进。掉头摆犁,则更加费力。几个来回,他就累得精疲力尽了。父亲的病未痊愈,不能下田干活,家里租种的几亩水田只有靠王近山一人扶犁耕耘。后来,王近山想出了一个好主意,让大弟连山在前面牵牛引耕,他腾出一只手来扶把换肩。这样,效率比原先高,人也感觉轻松了许多。

两度春秋,两度寒暑,父亲的病终于有了明显的好转。为了挣钱还债,父亲承担了家里的全部农活,让王近山到富人家打长工。农闲时,父亲还带他去宋埠帮人做豆腐。

就在王近山打长工、做短时,黄麻两县的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相继举行了“九月暴动”,随后又联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黄麻起义。许家田、黑石咀等村有几十个农民也参加了起义。这时的王近山虽然还不懂得“暴动”、“革命”到底是什么意思,但他亲眼看见拿刀叉参加革命的都是穷得没饭吃、没衣穿的农民,打杀的对象又都是那些有钱有势的富人,心里感到高兴,常常背着父母,

带上弹弓,跟在农民队伍后面凑热闹。有天下午,王近山从外面回来,路上正巧碰上了过去曾多次欺负过他的一位王姓地主婆。他闪身退到路边的一棵枫树后面,掏出随身携带的弹弓,捡了一颗小石子,手起石飞,不偏不倚,正好打在那地主婆的额头上,疼得她直跺脚。王近山开心极了。地主婆朝他看了看,没吭一声,捂着额头往回跑。王近山开始弄不明白:地主婆今天怎么这么老实,明明知道是我打的,屁都不敢放,一溜烟跑了。后来,人家告诉他,穷哥们闹革命,连黄安县长也吓得尿了裤子,地主婆还敢不老实!王近山由此领悟到:革命是咱穷人的出路。

1929年春,黄安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一些区、乡、村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农民革命武装赤卫队和群团组织少先队、妇女会、童子团(又称儿童团)等也相继建立。王近山第一个报名加入童子团,并被推举担任中队长。童子团的任务是站岗放哨,检查进入村苏地盘行人的路条,防止坏人入境。王近山站岗警惕性很高,也很机灵,从不轻信他人哄骗,外地人过他这一关还真不容易。有一次,家住县北紫云区的县赤卫大队长赵赐吾到黑石咀、许家田检查赤卫队工作,忘了带路条,在路口被王近山和同他一起站岗的另一名童子团员给卡住了。赵赐吾磨破了嘴皮,王近山硬是不让他通过。实在没有办法,他只好讲明白自己的身份,又说出了要找的人。王近山朝这位自称是赵赐吾的人左瞧右看,心有所动。他听人家说,赵赐吾左右两额各有一颗豆大的肉痣,痣上长着几根粗毛,人称“四眼狗”,是黄安有名的“游击大王”。从相貌上看,此人与传说中的赵赐吾一模一样。为了弄清真假,他对赵赐吾说:“您实在要过去,那就把您的盒子枪交给我,让我们蒙住您的眼睛,我们送您进村。”赵赐吾笑着点了点头。进了村,王近山解开赵赐吾的遮眼布条,村苏主席见了,责怪王近山:“你这小混帐,把赵大队长当土豪看待,还不快给赵大队长赔不是!”赵赐吾摆摆手说:“不能怪他,是我自己大意,忘了带路条。这小家伙把得很严,窍门很

多,是革命的好苗子,应该表扬他才对!”说完,大家都笑了起来。

童子团经常开会,检讨工作,请红军讲故事。王近山最喜欢听詹才芳讲故事,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革命道理,立志当一名勇敢的红军战士。詹才芳所在的黑石咀与许家田是同一个行政村。他早年跟随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董必武,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青年团组织,后被派回黄安参与组织农民运动和农民暴动,曾任红军特务队长和游击大队长等职。有天夜晚,詹才芳到许家田给童子团讲完故事准备返回游击队驻地,王近山缠住他,非要跟他一块去当红军。詹才芳嫌他年小,故意逗他:“你是童子团队长,你走了,谁个来顶你?”王近山以为有门了,认真地说:“这好办!我马上开童子团会,让大家再选一个就是!”詹才芳对他的答复十分满意,笑了笑说:“别这样,我是跟你开玩笑的。你现在年纪还小,好好干,等转入少先队后,找乡苏维埃政府开个介绍信,我保证收下你!”说完,詹才芳匆匆离去。王近山呆呆地站在那里,直到詹才芳的身影消失在夜幕之中。从此,他的心飞向了红军,飞向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930年2月,王近山如愿以偿转入少先队。正当他带着干粮准备去找詹才芳时,区赤卫队决定攻打东面沙河王家和帅家河的地主武装,要求附近数村的少先队前往呐喊助威。王近山被留了下来,跟着赤卫队长王文英向帅家河进发。战斗从黎明开始,到中午11时左右结束,打得异常激烈。按区里的要求,少先队不直接投入战斗,但枪炮一响,王近山却顾不上那么多,同赤卫队员一道冲进村里。村口的一群敌人被打散,其中有一个躲进了茅棚。王近山发现后,从背面绕进去,用梭标对准敌人的上背连戳数下,将其杀死,还缴获了一支半新不旧的“汉阳造”。战后,区委、区苏维埃政府主持召开群众大会,总结地方武装斗争经验,以利再战。会上,王近山受到区委书记的表扬。乡赤卫队长王文英提议王近山当村少先队队长,村苏主席等人也一致赞成,而王近山却不愿接

受。他说：“我要当红军！当红军天天有仗打，还能拿钢枪，那才叫过瘾哩！”

1930年6月初，王近山好不容易打听到詹才芳的队伍驻地。他怀揣着经过软磨硬缠得来的乡苏维埃政府的介绍信，跑了50多里路，来到黄安县北七里坪附近的一个小村庄，报名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军旅生涯。

二

进了红军部队，王近山以为这下可好，有仗打了，压根儿没想到他被分到红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当了个勤务兵。勤务兵的主要任务是为首长服务，如端茶倒水、铺床扫地等，一般不直接参加战斗。干了几天，他显然不安心，整天闷闷不乐。詹才芳是这个团的政治委员。王近山瞅了个空儿，鼓起勇气，对詹才芳说：“首长，请发支枪我，发矛子也行，让我上火线吧！”詹才芳早就看出了他的心思，耐心解释道：“革命不一定都要拿枪打仗。你当勤务兵，我当团政委，我们都是红军里面的成员，都是革命者。再说，你年纪小，安排当勤务员最合适。打仗可不是像放牛娃那样闹着玩，是拼命！”“我不怕死！”王近山仍不甘心。“当红军不是为了送死！”詹才芳装做生气的样子，板着脸说，“早知道你这么不服管教，不该答应收下你！”王近山被这句话给怔住了，他害怕首长把他送回许家田。此后，尽管心里不服，但不敢再提这个要求了。

王近山一心一意想扛枪打仗，这并未影响他努力做好勤务工作。他手脚勤快，办事利索，很少出差错。詹才芳对他的表现挺满意，还在会上夸奖过他。

三个月后，团里又分来了几个新入伍的小战士，勤务兵工作由他们接替，王近山则改为传令兵，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送信、传达指示，是传令兵的主要任务。因为这些事与作战关系密切，王近山很喜欢这项工作。他心眼多，工作之余留意观察团营首

长如何布阵,如何调兵遣将,如何指挥作战,从中学到了不少军事知识。

1930年冬,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边区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围剿”,王近山参加了这次反“围剿”作战。这是他人伍半年多以来第一次上火线。当时,红军部队发展很快,枪支不足,他只领到了一把铁叉,同战友们一道在枪林弹雨中冲杀。战后公布战果,他刺死、刺伤3个敌人,还缴获了一支长枪和两把大刀,以及10多发子弹。大家向他投来了羡慕的眼光。从这时开始,包括团长、政委在内,大家不再把他当小孩看待了。他被指定担任团部机枪连班长。1931年7月,又提升为机枪连排长。

1931年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黄安七里坪宣告成立,下辖第四军和第二十五军。11月10日。方面军主力在总指挥徐向前的率领下,发起了长达43天的黄安战役。王近山所在部队红四军第十师三十团在奉命攻下黄安城外围下徐家等敌据点后,担任围点打援战斗的总预备队。当嶂山地段阻援阵地即将被敌攻破、危及战役全局和方面军总部的安全时,徐向前亲自带领总部手枪营赶到前沿阵地,并令三十团迅速投入战斗,向敌军反击。王近山冲在最前面,勇猛扑向敌人。战斗进行中,有人前来报告,说徐总指挥负伤了。王近山听后怒火更旺,高呼“杀死这些狗日的”,更加勇猛地带领大家和敌人展开生死搏斗。经过半天血战,我军反击成功,把突入阻援阵地的大部分敌人消灭了,终于使战局转危为安。

黄安战役胜利后,伤未痊愈的徐向前在县城考棚方面军总指挥部主持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这次战役的经验。会议开始前,三十团政委詹才芳在门外同王近山谈话,徐向前见到他们,高兴地说:“才芳同志呀,想不到你手下还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小战士哟!”詹才芳向徐总报告:“他叫王近山,是我们三十团机枪连的排长,嶂山那一仗,他们排立了大功。”“很好!”徐向前和王近山一边

握手，一边说：“要继续努力，漂亮的排长同志！”霎时，王近山像个害羞的姑娘，脸涨得通红。他给首长敬了个礼，掉头就跑。

没过多久，徐总的话被人传开，一时间，三十团上上下下的人都跟王近山叫“漂亮排长”，直到他有了“王疯子”的绰号后，大家才改过口来，不再这样称呼他。

1932年初，经詹才芳、方敬禄介绍，王近山转入中国共产党，并升任红三十团机枪连副连长。

继黄安战役之后，红四方面军又连续发起了商潢、苏家埠、潢光等三大战役，在上述各次战役以及随后进行的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王近山表现突出，多次受到上级首长的表扬。他身先士卒，勇敢过人，逢战必有惊人之举。1932年夏，他任三十团第二营第六连连长时，有一次和敌人肉搏，抱住一个身材比他高大的敌人滚下悬崖。他头部被尖石撞开了一个洞，血流如注。在无人帮助的情况下，他以惊人的毅力，挪动身体，拔出手枪，将敌人打死。当六连的同志在山下找到他时，他已昏迷不醒。自此，他头上留下了一块深深的伤疤，洗澡都不能用毛巾搓洗。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未能粉碎国民党军第四次反革命“围剿”，主力被迫撤离鄂豫皖苏区，西行转战数千里，进入四川北部地区，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

这期间，王近山先后担任三十团第一营营长、第二营营长，二十八团第一营营长、第三营营长，二十八团副团长等职。

红军入川后，王近山率部参加了解放通、南、巴和反三路围攻等重要战役战斗，数度遇险。1933年10月中旬的一天，二十八团打罢宣汉出来，天已漆黑，什么都看不见，部队要马上行动，敌人还没有动静，不能再等了。王近山命令一营营长带队伍在前面走，边侦察边前进。一营出发不久，王近山带着团部的一二十个人随后跟进，走了一段路，遇见前面有支队伍也在往前走，大家以为是碰上了一营，都没有在意。谁知快接近时，前面的队伍竟然向我团部

开了火。原来前面的这支队伍是正在撤退的敌人，他们从叉路折过来，和我团部遭遇，黑灯瞎火，谁也看不见谁。后来敌人听见我团部有人讲话，声音不对，掉头就开枪。王近山左臂被敌人的子弹打伤，卫生队长张立三赶紧给他包扎伤口。开始大家有点紧张，王近山却沉着命令部队边打边撤。黑夜中，敌人也不敢追，双方很快脱离了接触。这次遇险，他差点送了命。但天不怕地不怕的王近山，过后根本没有把这次险情当回事。

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取得宣达战役胜利之后，总部决定乘胜扩大根据地，夺取开江、开县。而当时四川军阀刘湘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即将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发起大规模“六路围攻”。敌主力也在开江、开县集结，前锋已伸进兴隆场、三合场地区。这样，敌我双方拉开了激战序幕。我军计划由西绕道从南向北攻敌侧翼，切断敌人退回开县之路，同时也估计到敌人在退路被切断的情况下，必然向北面大山处撤退，并集中兵力向西迂回，反过来攻击我军后路。因此在部署时，红四军军长王宏坤、政委周纯全明确要求担任坚守西面山头防御任务的十师二十八团一定要坚守阵地，切不可出击，严防敌人反扑，夺占我军阵地。受领任务后，二十八团几位领导作了分工，王近山率三营控制一座山头，团长、政委率另两个营各守一座山头。战斗开始后，红军攻击部队很快突破敌防线，一举攻占三合场，插入敌纵深20余里，并猛烈扩大战果。敌军顶不住，忽向北退，并伺机向西迂回。这时，指挥坚守西面山头阵地的红四军一位领导乐于眼前取得的胜利，忘记了坚守阵地，保我后路的根本任务，见敌北撤，便下令出击。敌军正由北向西迂回，见我坚守西面山头的部队向外出击，乘机发起猛攻。我二十八团第一营、第二营因出击而失去山头阵地依托，寡不敌众，只得往后撤。这样，第一营、第二营的两个山头阵地丧失了。王近山很冷静，没有随团主力出击，而是严令第三营紧控山头，加固工事，严阵以待。敌军夺占了二十八团第一、二营主阵地后，三营阵地失去依托，顿

形孤立,形势陡然严峻起来。

由于红军后路受到威胁,战场形势急剧变化,主力部队被迫后撤。敌军为了切断红军退路,集中三四个团的兵力将三营控制的山头团团围住,轮番攻击。三营在王近山的沉着指挥下,孤军奋战,坚决阻击,同敌人反复拼杀,一次又一次打退了敌人的疯狂进攻,掩护主力向后转移。

这一次,参战的红军主力部队很危险,如果三营控制的山头被敌军占领,红军后路就会被切断,红军在数倍于己的敌军的强大攻击之下,后果不堪设想。军长王宏坤夸奖王近山立了大功,说他有勇有谋,很有军事头脑,很能理解上级首长的作战意图,全局观念也很强,在行动决策上又有自己的主见,要求各团营干部向他学习。此后不久,王近山被提升为二十八团团长的,率部参加反六路围攻作战。

二十八团是红四军主力团。在反六路围攻作战中,该团防守面最宽,战线也拉得最长,防守地域又大多是敌军重点进攻地段,且对手均是敌军的精锐部队。军、师首长给二十八团下达死命令:即使部队全部拼光,也要把阵地守住!王近山二话没说,一连数月,战斗在阵地,吃住在阵地,胜利在阵地。有一次,敌军在红二十八团鹰背咀一线阵地上投入了20多个团的精锐主力部队发起猛攻,由于军部交通队未按计划交给王近山指挥,二十八团在前沿的指战员在没有后备力量支援的情况下,虽给进攻之敌以重大杀伤,但终因敌众我寡,全部壮烈牺牲。接着,敌军又以七八个团的兵力突击二十八团纵深,抢占了一些有利地形,对红军部队造成重大威胁。王近山遵照军首长的指示,迅速组织部队,向敌占山头突击。这时,军部交通队也奉命到达突击地点。经过血战,攻下了山头,并将其牢牢控制在手。敌军不惜血本,又几次组织集团式疯狂反扑。红军坚决阻击,将敌人压在山头下。战斗中,王近山一面指挥部队,一面亲自端着机枪对冲在前面的敌人扫射。部队英勇顽强,